

国家最高科技智库呼之欲出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万物复苏、生命勃发的早春二月，乍暖还寒的中国大地上开始了新一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耕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如期召开，审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文件。其中，《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赫然在列，这是我国建设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立科技决策最高智库进程的一座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有中国特色、支撑国家发展全局、服务党中央重大科技决策需求的国家最高科技智库建设进入新阶段。

紧锣密鼓 大力推进

虽然《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的文本目前还没有正式对外发布，但是从本次会议新闻稿不难发现，建设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的重点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支撑国家发展全局、服务党中央重大科技决策需求”，其“最高层级”和“战略性定位”是不言而喻的。而“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无疑是承担上述使命的当然主体，也因此赋予了重要职能：既要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又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从全球科技创新视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国防建设等方面重大科技决策提供咨询建议。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劲波指出，我国在不同层面已经建立了多渠道、不同运行模式的科技创新决策咨询机制，但是与贯彻落实中央相关体制改革要求、回应创新发展相关决策咨询需求相比，需要进一步完善，而新通过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就是对传统机制的一次全方位提升。

2012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为我国新型科技智库构建指明了方向。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了《意见》，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科技咨询智库和企业智库”。9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建立国家科技决策咨询机制，发挥好科技界和智库对创新决策的支撑作用，成立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12月，根

据此前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

支撑发展 功不可没

案》，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5家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科技智库汇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充分发挥其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是我国在促进发展中的一条基本经验。

据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介绍，1955年5月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上，时任院长郭沫若代表学部建议“研究并制定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并很快被采纳，相关编制工作随后启动，包括全体学部委员在内的600多位科学家参与其中，为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技事业，特别是新技术的发展和“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王扬宗看来，中科院学部对中国科技发展此外还有3大贡献：1981年，89位学部委员联名建议国家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科研，该建议被采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1986年，王大珩等4位学部委员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后根据该建议出台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并拨出专款付诸实施，从而揭开了我国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高技术研究的序幕；1992年，张光斗等6位学部委员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后学部根据相关批示，形成了中国工程院建院方案并获批准，成立了中国工程院。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其高端科技智库的职能，由欧阳钟灿院士领衔的《基础研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咨询报告，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南海新华门

顶级表现 重在制度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指出，当今时代，高端科技智库必须研究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交汇期的历史机遇以实现新的发展，如何准确把握、及时布局科技创新的方向和重点以掌握竞争发展的主动权等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高端科技智库洞悉未来科技发展趋势、准确研判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及时为国家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提供前瞻咨询建议和系统解决方案。

全面提高我国科技智库的核心能力和竞争力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对此，王劲波解释，我们以前“跟踪”先进，在后面学习，而不知不觉中，我们在一些领域冲在前面，甚至要前沿“引领”，这就面临很大风险，更加亟需更高水平和能力的科技智库提供咨询服务。

关于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王劲波表示，参照国际上做法，委员会成员应该横跨各领域，除了包括来自科学界的人士，还应有产业界、教育界等的精英，突出代表性，同时又要控制好人数。

根据经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文件将会在较短时间内下发进入执行层面，这就是意味着《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包括国家最高科技智库在内的一整套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体系将落地生根，破土而出。



①



②



③

新中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们不仅是领域内泰斗，而且组成了国家高端科技智库。

①陈芳允，中国卫星测控奠基人之一。

②钱学森，“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

③杨嘉焯，空间自动控制专家。

④王大珩，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

⑤王淦昌，中国核科学奠基人之一。

⑥钱伟长，“中国力学之父”。



④



⑤



⑥

智库价值和建设之道

郭媛媛 杨雪杰

科技智库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这已经为世界各地的实践经验所证实。

科技智库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科技智库汇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如，2007—2009年，中科院组织包括60余名院士在内的300多名专家开展了“中国至205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对国家科技方面的相关决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部分结论性结果已出现在国家各部门的相关文件中。

科技智库为社会发展贡献智慧成果。科技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常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如，作为官方科技智库，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与环境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在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问题防治中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半官方科技智库也在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贡献智力。如，《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是以《环境保护》杂志为平台的环保政策、技术研究咨询机构，通过环保领域重要成果发布、节能环保项目评审等形式开展工作，以主题年会形式集纳政、产、学、研、媒的政策建议与决策参考。

科技智库为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信息交流平台。科技智库可围绕企业技术发展需求，通过专项调研，面向行业或企业开展竞争情报服务，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改进实现路径，提升产业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科技智库拥有丰富的科技文献，储备量大、收藏面广，其信息资源优势可为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

我国正处在构建新型科技智库的关键时期，在加强整体制度设计的同时，要把握好策略。

创新思维是科技智库建设的基石。一是建好“专家库”。大力整合院士等各方面专家资源，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方位、多专业、高质量的决策咨询“专家库”。选拔一批熟悉相关科技政策、有较强决策咨询能力的专家入库。二是配好“选题库”。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问题、关系民生的突出问题和科技工作者反映的重点问题，广泛征集决策咨询选题并建立“选题库”。三是着眼“战略库”。善于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建议，放眼宏观层面，善于提出总体思路和框架性建议。

科技期刊是构建新型科技智库的媒介。新型科技智库的建设可在科技期刊自身顾问团和编委会的基础上，将各期刊的资源进行整合提升，建设大数据智库，根据专家的特长领域进行分类，成立大数据智库下的专项研究组或专业委员会，提供更为专业的智力产出。

协同发展是创建新型科技智库的手段。我国大学智库是新型科技智库的重要引擎，通过整合资源，建立整体的大学科技智库联盟，辅以稳定与科学的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中央官方科技智库应吸纳地方科技智库的研究进展，中央官方科技智库通过地方培训、项目验收等活动，加大与地方智库间的合作；非官方智库间可通过定期的互动交流共享最新科研成果。纵向上延伸科技智库服务对象链，各智库可以发挥专长，互为补充，形成既融合官方智库信息优势，又吸纳大学智库的专家力量，兼具非官方智库的社会资源的大科技智库。

话语权是提升科技智库水平的动力。一是明确新型科技智库的角色定位。科技智库应成为思想创新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核心角色和首要功能是以客观的态度、求真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为决策部门提供可操作性的科技发展策略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二是在政府、公众和科技智库之间搭建共同探讨的平台，为科技智库了解公众需求提供窗口，并为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渠道。三是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参与。新型科技智库可以通过解读国内外重大科技进展和发展政策，培养公众的科技参与热情；组织各种针对政府管理人员和企业人员的培训项目，对精英人员进行科技政策教育。四是加大国际传播，提升国际影响力。加大我国科技智库相关成果的国际交流和传播力度，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辐射面。



【编者按】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对其中一些国家的相关实践，长期从事科技战略与规划研究的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劲波进行了系统梳理。

国外怎么建设科技智库

王劲波

国家层面 法定授权的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或理事会，为政府或议会提供综合性的科学技术创新政策建议。1993年11月，美国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总统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副总统、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相关内阁部长、各机构主管科学与技术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白宫官员，其性质是在行政管理部门内协调不同联邦研发主体及实体间科技政策的内阁级委员会；2014年5月，日本根据“内阁府设置法”将总理大臣任主席的“内阁综合科学技术会议”更名为“内阁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成员包括相关部门首长和来自教育界、科技界、产业界的精英，进一步强化科技预算、科技战略与具体策略的综合协调功能，为顶层决策提供咨询建议；2014年10月，澳大利亚建立联邦科学理事会，作为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由总理任主席，成员包括工业部长、教育部长、卫生部长、首席科学家及来自科研教育界和工业界的杰出代表，负责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创新与科学经费分配及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指导，下设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由首席科学家任主席。

咨询委员会 为政府部门提供专业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建议。在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施行了半个多世纪，政府科学办公室主任即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兼任首相科学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席，首要职责是与各部门的科学顾问紧密合作，帮助内阁办公室了解各部门的科学工作并进行未来规划，从顶层协调资源配置，同时在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决策者之间建立交流机制，向学术界和工业界征询咨询建议；澳大利亚、以色列等政府都设有政府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主要部门设立科学顾问或首席科学家，以支撑科学决策。

公共机构层面 法定常设或临时性设立的咨询机构，被授权或受委托为特定问题提供科学、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2001年9月，美国设立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由产学研及非政府组织的知识精英组成，主要职责是就科技政策相关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协助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密切与社会各界的联系；2013年12月，法国根据“高等教育与研究法”以研究战略委员会取代原国家科学与高技术高等理事会，作为总理的咨询机构，研究战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或授权教研部长主持，成员包括科技界、经济社会界的

高水平专家及议会代表、地方代表。

社会机构层面 各类专业学术机构、组织及智库应邀或者自发向政府提供政策报告和建议。1863年3月，美国总统林肯签署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法案。依据成立法案，其属性为民间非营利性自治组织，要对任何政府部门提出的科学技术主题进行“调查、检验、实验”并完成报告。为更好地满足政府科技决策咨询需求，1916年，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执行机构的国家研究理事会成立；1964年和1970年分别成立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研究院，都是荣誉性组织和权威咨询机构。成立于1848年的美国科学促进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综合性民间科学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影响科学技术创新决策。

个人层面 长期或临时由政府赋予科学顾问或决策智囊等正式咨询身份。主要包括两种身份：专家身份，有明确的科学决策咨询职责，享有良好学术声誉，能够就政策决策提供权威、独立且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建议；公众身份，代表特定政策议题相关领域的实践者、影响对象及利益相关者，有明确的民主决策咨询任务，享有良好社会声誉，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来自实践和需求方的公正合理建议。